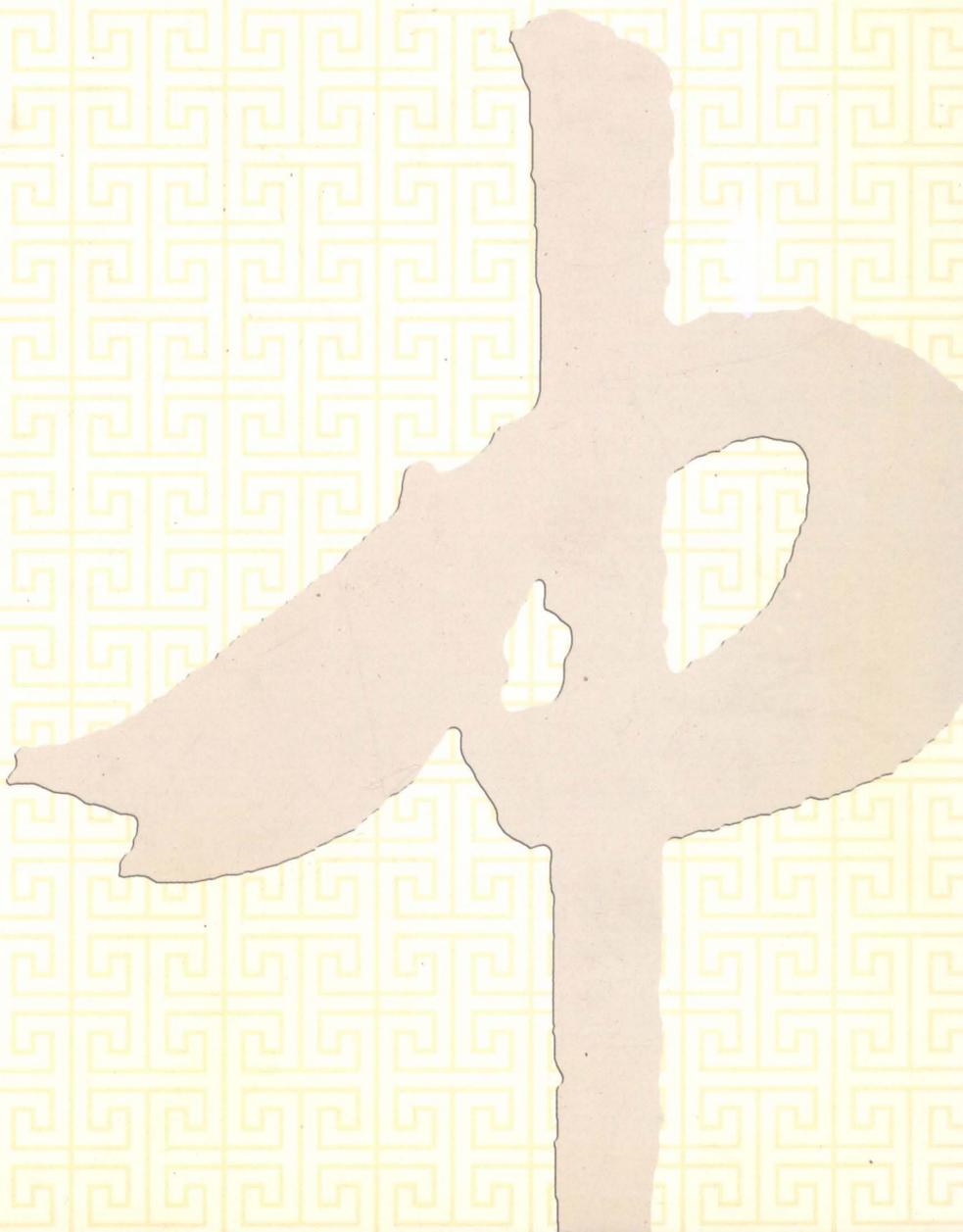


# 豫当代 商代 人物志

当代豫商人物志编纂委员会编

Contemporary  
Henan Business Portraits

卷二



中州古籍出版社



# 豫当代 商人 人物志

当代豫商人物志编纂委员会编

(卷二)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豫商人物志/《当代豫商人物志》编纂委员会编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5348 - 3658 - 9

I. ①当… II. ①当… III. ①企业家 - 列传 - 河南省  
—现代 IV. ①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3097 号

---

责任编辑: 王小方 吕兵伟

责任校对: 孙 波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郑州志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张: 41

字 数: 1100 千字 印数: 1 - 3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 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56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当代豫商人物志》编委会

主 任：王全书（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副 主 任：袁祖亮（全国政协常委）

梁 静（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

陈义初（九届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省豫商联合会会长）

委 员：肖桂彬（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任）

林景顺（河南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

杨龙驰（河南省工商联副巡视员）

张正林（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阮少华（河南省国资委副主任）

苗永清（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

李西斌（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贾凤昌（河南省地税局党组成员、巡视员）

名 誉 总 纂：王全书

总 纂：陈义初

执 行 总 纂：许还平（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执 行 副 总 纂：袁伦中（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处长）

## 《当代豫商人物志》总编室

主 任：许还平

副 主 任：袁伦中 高 红

策 划：段文盛 程 刚 蒋剑锋

编 辑：程 刚 张燕欣 马战胜 郭汉锁 庄丽坤

徐国栋 周 峥 王晓川 李 方 陈 瑞

张伟英 李 丹 王小萍 李 冬 张国轩

赵 静 王洁芳

发 行：马战胜 何文杰 尚晓飞 苗帅升 苗战领

## 凡例

### 一、指导思想

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服务发展、有益后世为宗旨，力求融思想性、资料性、学术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为一体，力争成为对外宣传河南、宣传豫商的一方平台，成为外界了解河南、了解豫商的一扇窗户，力争使豫商精英的成长史成为鼓励人们创业的典范。

### 二、收录范围

本志收录在全省乃至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豫商代表人物，同时兼顾在一定地域范围和某些方面有突出贡献的豫商精英。

1. 公有制企业任期较长、贡献较大的代表人物；
2. 贡献、影响较大且奉公守法的非公有制企业代表人物；
3. 在环保、节能、社会公益、科技创新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或其他个性特点鲜明，对今人后世具有较大启迪作用的豫商人物。
4. 在省外（海外）发展的豫商代表人物。

### 三、时空界限

入志人物的事迹均在 1978 年至 2010 年底之间；本籍人物以祖居河南或出生于河南为准，客籍人物以在河南工作生活为准。

### 四、编排体例

1. 坚持严谨的志书体例，入志人物均以条目形式反映，一人一条，以人系事。以史家之笔全面记述豫商发展历程及个人成长奋斗史。同时，以附录的形式，简介入志人物所在企业的基本情况。

2. 排序方法以入志人物的姓氏拼音先后为序，后附所在企业简介。若同一企业有多个人物入志，其所在企业的简介附在志书中该企业最后一个出现的人物之后。

3. 以人为主，事随人出。个人及企业资料以事实、数据为支撑。

4. 以文为主，宜图则图，力求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 五、编写规范

1. 使用规范的记述体语体文，不用文言或半文言。

2. 使用 1986 年 10 月由国务院批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所收录的简化字。

3. 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和时刻、记数与计量用阿拉伯数字，定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用汉字。

4. 标点符号以 1990 年 3 月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重新发布修订后的《标点符号用法》，即以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家标准 (GB/T15834—1995) 为依据。

## 序一

### 商由豫兴 播迁致远



王全书，现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会长，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名誉会长。早年任职于河南省经济研究所，省计经委，平顶山市委、市政府。1993年后历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职。著有《感悟中原》（上、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论简政放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历代荐贤纳贤》（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与机构设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价值》（红旗出版社出版）、《与时俱进的哲学思考》（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书。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说过：世界上“有两个公认的最聪明的民族，同时也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是中华民族。”河南地处“中国之中”，河南人号称“中国人中的中国人。”著名作家路遥也曾把在西北部奔走谋生的河南人比作“中国的吉普赛人”。据考证，商人名称缘起于河南，商业活动发祥于河南，华商文化根植于河南，商业都市兴盛于河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商由豫兴，播迁致远。

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因辖境大部在黄河以南而得名。据载，禹划九州，河南属九州之中的豫州，所以简称“豫”，又谓“中州”；又因其东半部为广阔平坦大平原，而得“中原”美名。历史上，先后有20多个朝代200多位帝王在此建都立业，中国八大古都，河南独占其四：洛阳、开封、郑州、安阳。这里“缩毂南北、枢纽东西”，关乎天下兴亡；这里开发最早、经济发展，关乎国计民生；这里历史厚重、文明久远，关乎文化传承。

“三皇五帝”时期，炎帝“都于陈（今淮阳），作五弦之琴”，“始教天下种谷”，“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明此时已有原始商业活动。黄帝“居轩辕之丘（今新郑），而娶于西陵（地望在今西平）之女”，“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可见修路通渠更利于远距离交换。帝尝之时，“神农作市，高阳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祝融时任“火正”，“郑，祝融之墟也”。此时，交换活动不仅有固定时间和场所，而且还设有管理人员，可视为商业雏形。《管子·揆度篇》曰“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禹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说明尧舜时代，不仅有正常的交易产生，而且交易之物已明显区分了价值。生于姚虚

(今濮阳徐镇)、迁居负夏(又名瑕丘,今濮阳五里乡瑕丘村)的帝舜,曾“贩于顿丘(今浚县)”、“债于传虚(今山西解虞,当地盛产食盐)”,据此,河南大学古代史教授朱绍侯认为:“舜在成为尧的接班人之前,是一位勤奋的劳动者和商人。”舜继尧位后,宣布“同律,度量衡”,并极其重视食盐生产。因此,可以说,舜既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又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不仅是“豫商”之祖,而且是华商之祖,更是盐商之祖。

夏商周时期,河南是全国政治核心区、经济繁盛区、文化繁荣区,同样是商业勃兴、商人得名的专属区。《史记·货殖列传》称,居住在颍川(今禹州)、南阳一带的夏人“俗杂好事,业多贾”。居于商(即今之商丘;另说:其地在滴水,即今之漳水流域,以豫北之漳、卫地区为主)的商族人,善耕能牧,长于经商。史载“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殷人服象”,此时的马、牛、象被驯服后,主要是役力牵拉,更便于长途贩运货物。王亥“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一次与有易部落(今河北省境内)交易时,王亥被杀,牛羊被夺。后来,王亥之子上甲微出兵灭掉有易,夺回大量财产和奴隶。据此判断,王亥是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最早豫商,也可视作中国商人的始祖。

据说,后世称“贩卖商品并从中获得利润的人”为商人,始自西周灭殷之后,原本是周族人对殷商遗民略带轻蔑的专称。周武王伐纣灭殷后,为便于统治管辖,将部分商族人迁往洛阳以东地区居住,“各居其室,田其田”,并给以自由民身份。这些殷商遗民中,原本过惯奢华生活的奴隶主贵族,因长期脱离生产活动而身无所长,不会也不愿从事繁重农工生产,因久受“殷人重贾”风气熏染,谙熟贩运获利和买卖生财之道,于是便听从周公告诫,“重操旧业”,奔走各地,贩卖货物,在为周朝贵族服务中,赚取差价以补贴家用。当时由于做买卖的殷商遗民很多,以至于造成周族人的误解,他们认为凡是做买卖的都是商族人,因此“商人”便成了买卖人的代名词。后来,尽管族群界限淡化,非商族人做买卖的也多了起来,但是人们仍然将“商人”作为买卖人的通称。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中国历史进入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变成了精彩纷呈的大舞台:春秋五霸纵横捭阖,战国七雄牧马逐鹿;诸子百家各争春秋,十家九流才俊辈出;生产关系重新整合,生产要素活力迸发。同样,豫商群体空前活跃,彪炳千秋。春秋前期,郑国商人弦高,贩牛去周(今洛阳),途遇秦师,断其袭郑,遂以12头牛和4张熟牛皮犒赏秦将,秦师放弃袭郑计划,郑国得以保全,郑君“以存国之功赏弦高,弦高辞之”。大体与弦高同期,河南民权人计然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商业理论家,“计然之策”,用之于国则国富,用之于家则家殷。范蠡正因师法计然而“计定天下,策富商海”,功成名就后的范蠡汲取计然思想之精华,著成《范子计然》一书,这本书和《孙子兵法》一样,既是一本兵法奇书,又是一本商业宝典,被历代商家当做秘而不宣、用而不言的传家宝,据说胡雪岩就是凭借此书而富甲天下的。春秋战国时期,名气最大的豫商是儒商子贡和“商圣”范蠡,二人分别成就了“端木生涯”、“陶朱事业”,后世商人将二者合并书写成联,悬于店铺厅堂;生意最大的是吕不韦,他不仅依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而且敢于做“货天下”的买卖,最终集商、官、学于一身,成就千古伟业;最为纯正(正统)的豫商是“治生鼻祖”白圭。

春秋战国时期,豫商的向外播迁已成趋势,豫商的“国际”影响力已经显现。爱国商人弦高,家在郑国,却“西市于周”;辞赏不受后,弦高“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返”。儒商子贡曾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并在财力上予以资助,他是“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鬻贵”的自由商,“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举(贮)鬻财于莒鲁之间”。《史记》还说,子贡“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意思是经常与各国权贵往来交接,并能与国君“分庭抗礼”,最后子贡死在商业发达的齐国。“商圣”范蠡更是拜师于计然,用“计然之计”成名于越国,辞官后至齐国经商,最后隐居于定陶。吕不韦生于卫国,经商致富在阳翟,

行迹遍布越、韩、魏、秦、楚诸国，长期在邯郸经营，在咸阳为政，罢相后秦王政曾下令迁他到蜀郡，自杀后方归葬洛阳。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生产和商业大发展的时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司马迁对当时众生求富逐利情形的生动描述，也从社会文化层面展现了当时交易的兴盛和商业的繁荣。这一时期，河南的商业得到长足发展。秦汉时期河南商业繁荣的表现之一是商业队伍庞大，闻名全国，《盐铁论·力耕》说：“宛、周、齐、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表现之二是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商业都市，《史记·货殖列传》列19个商业城市，河南有7个：温、轵、洛阳、颍川、宛、陈、睢阳；《盐铁论·通有》所举12座商业城市，河南有8个，占66.6%。表现之三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对外贸易发达，《后汉书·西域传》云：“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表现之四是货、币俱丰，现代考古发掘出土大量这一时期的商品和货币。

秦汉时期，河南人发挥着主导经济政策、主宰经济命脉的作用。秦代，继吕不韦之后，上蔡人李斯是制定和实施“国策”的重要参与者。西汉，政论上有贾谊（洛阳人），《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影响广泛而深远；桓宽（上蔡人）《盐铁论》、晁错（禹州人）《论贵粟疏》也在商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东汉，“洛阳帝都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上至光武皇帝，中至文臣武将，下至庄主商贾，几乎是河南人的天下。这一时期，著名“豫商”代表人物有大贩运商师史、大冶铁商孔仅、大爱国商卜式、大理财家桑弘羊、大庄园主樊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大体说来，这一时期，河南地区的商业发展经历了“三起三落”，即魏晋时期的恢复与发展，十六国时期的破坏与重新恢复，北朝时期的恢复与发展。西晋的短期统一，打破各地的交通阻隔，商业贩运活动日趋频繁。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洛阳不仅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并且是国际性的商业大城市，还带动了中原其他城市商品贸易的兴盛。不少人走上了经商之路，有弃农经商的小商贩，也有囤积居奇的大商人，就连皇室宗亲也投入了经商行列。如西晋义阳王司马望之子司马齐利用其宗室身份和地位，“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再如北魏时相州（今安阳）刺史李世哲，在邙城、洛阳等地的市场上贩卖各种货物。当时的民间商人刘宝，最为富有，在各地设立商业网点，掌握各地价格信息，并配备车船马匹等交通工具，“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

这一时期，上承秦汉文明，下启隋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民族融合时期。北方屡遭战乱，社会经济破坏严重，而江南地区受到战乱影响较小，加上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并带去先进生产技术，长期以来形成的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面逐渐倒置，以中原经济区和江南经济区为标志的两大经济区域初步形成。南迁的中原人包括诸多商贾富户，在促进民族融合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随司马氏（温县籍）政权迁徙转移的河南士绅和财富，无法估计，这也是豫商播迁的一个重要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盛世，河南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河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主要有：一是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打破了区域壁垒和人为障碍，为货畅其流创造了条件；二是交易网络的恢复和发展，联通各地物流、人流，为商贸活动提供了基础；三是全国重大工程建设促进了商业发展，其间关乎河南发展的大项目有三个（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以及唐前期对大运河的重修和扩建）；四是货币的统一，为交易交流创造了条件，唐高祖李渊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五是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发展，推动商业贸易走向繁盛；六

是整个社会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越来越把商业当做一个重要行业,尤其在唐代,政治开明,社会开放,“弃本逐末”现象十分普遍,商人队伍不断壮大。有一首诗,生动反映了河南地区商业的盛况:“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做商贾。”

隋唐时期,河南地区商业兴盛集中体现在洛阳、汴州等中心城市的繁荣上。城市里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市,市中有邸店和柜坊,柜坊是中国银行的雏形,还出现了“飞钱”,更有利于大宗商品的安全交易和异地交易。到唐代后期突破“日中为市”的传统,出现了“夜市”。洛阳不仅是全国的贸易中心,同时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洛阳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通远市临通济渠,周围6里,20门分路入市,商旅云集,市内存放着各地来交易的舟船、舳舻等,往往数以万计;丰都市周围有8里,通12门,市内有120行,3000多店肆,“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隋唐时期,拥有巨资的商人很多,例如洛阳商人李秀生一次捐资数万,在南市附近的洛水上架起一座长200步的石桥。唐后期,洛阳商人捐献钱粮给军队,可满足数月之用。

北宋时期,河南地区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交通中心,称得上是河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各项事业发展达到鼎盛,因此,也可以说北宋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是时的河南历史。北宋时期,河南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商业兴盛的最大优势,是全国中心地位的确立和进一步加强。北宋设立四京,除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外,东京开封府(今开封)、南京应天府(今商丘)、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均在河南境内。据吴涛等宋史专家估算,开封城人口约有15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即使在今天也堪称大都市。河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商业兴盛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政府所采取的减免田税、奖励耕垦、兴修水利、引种水稻等措施,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的,首推城市及周边地带的蔬菜业和林木业,汴京四郊有很多菜园,西京洛阳所种牡丹号称“天下第一”。河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原因,也是商业兴盛的重要体现,是手工业的高水平发展。京师开封绫锦院工匠最多时达1034人,有锦绮机400余张。“钩、汝、官、哥、定”宋代五大名窑中,有三处在河南。河南地区商业兴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商税收入居全国三甲。东京都商税院的商税收入最高,达402379贯,占全国商税总收入的5.19%,占河南商税的38.5%。河南地区商业兴盛的重要表现之二,是镇市稠密繁荣。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全国总镇数为1871个,其中河南拥有175镇,占全国总镇数的9.35%。河南地区商业兴盛的重要表现之三,是行会组织的健全和重商思想的盛行。河南地区商业兴盛的重要表现之四,富商大贾成批涌现。《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宋金对峙过程中,中原居民大批南迁(包括绝大部分的官宦、地主、商贾),河南地区纳入金朝版图,尽管金朝曾两次以开封为都,河南在全国的地位仍迅速下降。1279年,元灭南宋,开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空前发展壮大时期,由于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河南地位与此前历朝已不可同日而语。宋代以前,作为全国中心的中原地区,又是动乱频率最高的地区。据专家考证,徽商的始祖,大多是(西)晋末、唐末、北宋南迁的中原名族,徽州56姓,其中49姓是由中原迁去的。中原地区的物资、宗教、门阀、婚姻、丧祭、伦理、建筑诸文化基因也传到了那里。地狭人稠、被逼从商的徽州商人,亦带有浓重的中原文化气息。从后来的浙商、潮汕、闽台诸商帮形成过程及其经商文化元素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中原人的影子,尤其是“客家人”、“河洛郎”,他们一直信奉“根在河洛,祖在中原”。有专家考证,现在的固始是客家人南迁的中原出发地,“固始”已成为族群记忆符号。

元代“贾鲁治河”为明清河南商业发展创造了新优势,朱仙镇、周家口的异军突起完全可归功于以贾鲁之名命名的那条新河。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决口,河道北移。八年(1348年),贾鲁拟定治河策略。十一年(1351年),任工部尚书、充总治河防使,征发民工15万、军士2万,疏浚140公里河道,

使河复故道，南流合淮入海。治河过程中，贾鲁还开挖疏通了一条新河——贾鲁河。这条河不仅发挥了“治河减灾”的基本功用，而且成为了沟通州县、外联江淮的水运干线。

随着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河南不仅失去了北宋以前“聚人气、得地利”的传统优势，而且随人口迁走的还有财富和技艺。在改朝换代的战乱中，河南被毁的不仅是城池和关隘，而且遭殃的是生命和财产，财富和技艺拥有者（按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可谓“社会精英”）或者外逃或者被杀，固守本地的也日渐衰微。再加上战乱时期的政事荒疏和黄河泛滥，中原地区的繁荣已成明日黄花。但是，河南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新生政权不可能对其置之不理（清朝视河南为关系社稷安危的“腹心之地”）。明代的移民垦荒政策和清朝的“耕者有其田”措施，对河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相应地为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创造了条件。

元末战乱和黄河泛滥，造成河南人口减少、土地荒芜，而与河南毗邻的山西则人多地狭、衣食不足（这也是晋商形成的原因之一）。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的50多年间，户部组织太原、平阳所属近70县的山西人分批迁入河南定居，主要集中在怀庆、卫辉、彰德、开封、归德、汝宁（今汝南）、南阳、河南（今洛阳）等8府12州88县。这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被称为“洪洞移民”。洪洞移民，给中原地区增添了劳动力和生机，同时山西的风俗文化也随之传入河南，其“重商”传统在怀庆帮、彰德帮和康百万等商人群体身上也可觅得些许影子。随着大批移民的落户，1394年明朝颁布了“额外垦荒，永不起科”的诏令，规定河南、山东等4省农民除纳税土地外，如有余力继续垦荒，垦地听其自有，永不征税。同年政府下令，河南、山东地区的农民，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的土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一系列措施的颁行，对河南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到万历年间，河南人口增加到519万，有耕地74万顷（约占全国的10.5%，居第三位），在粮食产量逐步提高的同时，经济作物产量也不断增加，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同时，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进而也促进了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初，经过明末农民起义军对官宦贵戚和地主豪绅的打击，河南地区许多原本无地的佃农获得了土地，成为自耕农。清王朝把这些土地叫“更名田”，承认属于耕者所有，并宣布以明代一条鞭法征派赋役，免除一切杂派和“三饷”。康熙治河，历时10年，动用民工千万，终使“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淹没之地也随之变成良田。随着奖励垦荒、组织屯田等政策的实施，河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恢复到明末战乱前的水平，并有所提高。康熙时河南耕地面积比顺治时增加了200余万顷，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河南人口达到1650多万。

明清时期，进入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阶段，也是地域性商帮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代中期以后，以徽商和晋商为代表的各地商人更多地以群体的力量活跃在商业舞台和社会生活领域，开始了中国商业历史上的商帮时代。地处天下之中的河南，以其深厚的商业文化底蕴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水陆交通网络，不仅成为国内商业交通线路的必经之地和各个商帮经营活动的重要区域，而且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豫商的活动提供了广阔舞台。这一时期形成了怀川、彰德等商人群体。当时的怀庆府包括河内、济源、温县、孟县、修武、武陟、阳武、原武8县（即现在的济源、沁阳、原阳等地），以该地区商人核心建立起来的集团统称为怀帮。他们立足于本地资源，如四大怀药、棉花、棉布、粮食、竹器、矿石等，积极在全国各地开拓市场。在辉县百泉药材市场上，怀帮商人占据主导地位，禹州药材大会上有一个俗语：“十三帮一大片，不如怀帮一个殿。”开封、南阳、信阳、周家口、朱仙镇等地都有怀帮的组织和经营机构，他们以药材为龙头，把本地农产品销往各地市场，再贩卖各地货物。怀庆商人的行踪遍及京、津、山、陕、甘等北方市场和江南各省，并在许多地方建有怀商会馆。他们在长期的商业经营过程中，积累了巨额家资，如河内药商“千金之家比屋可数，善封殖者，家累巨万，不止十数而已”。

在中原地区城镇繁荣和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国内其他省区的商贾纷纷前来中原，开店设铺，投资经营。明中期以后，水陆商路有了很大扩展，全国各地的商帮和商人，纷纷通过四通八达的商路来到河南从事商业经营或进行转口贸易，“八方风雨汇中州”，“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计有山陕商、徽商、河北商、金陵商、山东商、江西商、湖北商、湖南商等。为方便在河南经营，客商广建会馆。客商在中原商业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与本地商人即豫商竞争、合作、互动、共赢，为中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贡献力量。部分客商落籍河南，逐渐融入豫商之中。

鸦片战争以后，和全国一样，河南社会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因素缓慢发展，自然经济日渐衰弱。京汉、汴洛、道清等铁路的开通促进了豫商队伍的扩大，也使豫商在整体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近代豫商是河南民族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河南社会发展的进步因素之一，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记述豫商历史，提炼豫商精神，不能不写纵跨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累富12代人、持续400余年的巩义康百万家族。康家从明朝中期开始，以经营店铺起家，以利用漕运发家，以收购土地兴家，以儒家文化传家。到清代中期，康百万家族富甲豫、鲁、陕三省，船行洛、黄、运、泾、渭、沂六河，两次悬挂“良田千顷”金字招牌，土地达18万亩，财富无以数计。民谚称其“头枕泾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期间，康家曾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黑石关修建行宫、架设浮桥、铺设御道，还向朝廷奉献百万银两，被慈禧太后御封“康百万”，名扬天下。中国人常言“富不过三代”，而康百万家族却连续兴盛十二代，堪称一代儒商典范、豫商楷模。康家世代相传的家训《留余》富含哲理：“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若辈知昌家之道乎？留余忌尽而已。”“留余”体现的“尚中庸、积荫德、重家教”思想正是传统豫商精神的浓缩。我认为，从康百万家族身上可以总结借鉴的传统豫商精神包含四个方面：第一，崇尚中庸，低调内敛。“致中和”、“居贵敬”、“行贵简”、“端洁退让”等匾额在康家随处可见，不是那种暴发户的得志猖狂、飞扬跋扈，而是一种大风大浪之后的处变不惊、博大宽容。第二，勤俭为本，耕读传家。康百万家族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处世无他莫若为善，传家有道还是读书”，康家重视读书和教育是其长盛不衰的动力源泉。第三，乐善好施，欲取先予。康百万修河堤、建学校、赈灾民，灾荒之年烧毁契约，仗义疏财，被老百姓称为“大善人”；经商中，康家坚持“以义制利，以义为上”，依靠先进实用的管理方法，把家族企业变为企业家族。第四，审时度势，敢为人先。第六代庄园主康大勇突破“仕不经商”思想，毅然开辟大河行船；他们突破地域限制，长距离搞运输贸易；他们沉着老练、稳扎稳打，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创业、立业、守业，绘就了一桩财富神话。

历史上传统豫商的贡献，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必要原料和各种用品；第二，将农业和手工业部门生产出的各类产品带进流通领域，实现了产品的使用价值，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部门不断的再生产；第三，将各种商品销往城乡各地，丰富各地的商品种类，繁荣了城镇经济，也带动了城镇的兴起和发展；第四，将本省商品运至外地，又将外地商品运回本省，加强了地域间、省域间的商品交换和互通有无；第五，开辟出许多水陆商品通道，这些通道成为连接省内各地和省际之间的重要纽带，对加强各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创造出许多有价值的经营方法和经营理念，这些成果凝炼成为厚重精深的豫商文化，丰富了中原文明的内容。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深入研究豫商发展史，是为了继承豫商传统、弘扬豫商精神、学习豫商品格，激励引导新豫商在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尽显身手。首先，要继续

传统豫商的“两大传统”：一是宽阔的政治视野，集中体现在爱国爱乡爱家上，弦高犒劳秦师以救国护家的义举，先被白圭、吕不韦、卜式等提炼成为政治智慧，后发展成重祖根、恋故土的爱乡情怀；二是深厚的文化底蕴，源起于“端木生涯、陶朱事业”，主流是“商道从儒”，表现为“仁中取利，义内求财”。其次，要体悟传统豫商的“两大商道”：一是“薄利”，范蠡逐“什一之利”而能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个中奥妙耐人寻味，后来豫商多义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深受“薄利”之影响；二是“深藏”，兼具商儒和儒商特征的子贡，虽“家累千金”，且能与国君“分庭抗礼”，却坚守“为富当仁”信条，做到“良贾深藏若虚”。康百万家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在其“留余”，说明康家真正体悟出了“薄利”、“深藏”之大道。再次，要弘扬传统豫商的“四点精神”，集中体现在康氏家族身上（详见前文）。最后，要学习传统豫商的“四种品格”：一是“诚信为本”，豫商多诚商，根源在儒家“诚、信”道德影响；二是“以义取利”，“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无论在国家民族的大义上，还是在持家奉亲的情义上，抑或在处世交往的道义上，传统豫商都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三是“乐群贵和”，居中的位置、和缓的地势、厚重的文化，养成了河南人中庸、平和、乐群、好施的禀性，传统豫商讲究和气生财，外出经商讲究“老乡帮老乡”；四是“勤勉尚俭”，师史“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豫商正是靠着吃苦耐劳而发家，借着勤俭节约而传家，凭着自强不息而旺家。

建设中原经济区，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是新豫商的新机遇、大舞台。新豫商应当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唱主角；学会用好传统豫商的精神实质，新豫商必会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唱好主角。这是我们研究传统豫商的根本目的。建设中原经济区，需要强力的文化支撑；发挥新豫商的主力军作用，也需要建设适应新形势的豫商文化。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战略中，“华夏历史文明传承核心区”定位准确，必然要求突出中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高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当然，商业发展史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豫商发展史也是中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上讲，研究豫商发展史，不仅具有激发新豫商活力、提升现实生产力的作用，而且可以在建设中原经济区过程中发挥强大的文化支撑作用。

豫商历史源远流长，豫商精英世代迭出，豫商文化传承有脉。为了凝聚豫商力量、树立豫商形象、弘扬豫商精神、传播豫商文化、促进豫商合作、团结豫商精英，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与河南省豫商联合会组织编纂了《当代豫商人物志》一书，这是一件大好事。在编纂过程中，省工商联、省国资委、省政协经济委等部门协同配合，做了大量工作，义初、还平诸同志亲自抓、具体做，付出了大量心血。付梓之时，邀我作序。欣喜之余，唯希望出好用好此书，尤其是崛起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新豫商”，一定要抓住建设中原经济区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不断发展壮大自身实力，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2011年9月16日

## 序二

### 新豫商 新特征 新机遇



陈义初，男，汉族，浙江镇海人，1945年8月生于上海市。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河南省豫商联合会会长。1968年7月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先后任职于开封拖拉机电器厂、河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1992年6月调郑州市人民政府工作，历任副市长、代市长、市长等职；2003年1月任政协河南省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曾任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七届河南省委委员。2004年以来，致力于推动各地成立河南商会，并组织创办了豫商大会，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出版有专著《感悟城市——我做市长》、《有感而发》、《案例与原则——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主编有《豫商发展史与豫商案例研究》丛书和河洛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以及河南经济实力的增强，以河南籍企业家为骨干的新豫商迅速崛起，在全国新的经济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取得相应的话语权。新豫商从萌生肇始到发展壮大、再到聚集成势的华丽蝶变大体可分三个阶段：1979年至1992年，探索中前进，争论（姓社姓资）中发展，农民进城不再是“盲流”，打工族成为新豫商的奠基人；1992年至2000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不争论”，“大胆试”，“大胆闯”，“投机倒把”不再入刑，新豫商大批涌现；进入新世纪后，新豫商群体崛起并聚集成势。2004年7月，国内第一家豫商组织——上海市河南商会成立；同年举办“中原崛起与企业家责任”高峰论坛，首次提出“河南人经济”的命题；2006年首届豫商大会召开，有人将该年称为新豫商崛起元年，而首届豫商大会的举办被看做豫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本土豫商已经成为河南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作为新豫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河南民营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0%。他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扬长避短，在农产品加工、服装、机械制造等行业屡创奇迹。河南双汇集团的年销售额已经超过200亿元，河南速冻食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60%，郑州生产的女裤已经占全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宇通客车纵横天下，白象方便面、金星啤酒已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他们是新豫

商的主力，支撑着河南经济总量跻身并连年稳居全国前五名。

在省境之外，数以千万计的河南人抢滩上海、登陆广东、勇闯新疆、奉献首都……他们借别人的“地”种自己的“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财富传奇。在北京，一批懂市场、善经营的河南人，在市场竞争的前沿阵地上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成为餐饮、房地产、美容等行业的佼佼者，河南人创办的企业占据北京建筑物拆除市场70%以上份额。在上海，河南人有80多万，创办企业达6000多家，资产在10亿元以上的不下10家，河南人经营的运输业已占到上海整个运输业的1/4；上海滩60%至70%的海鲜生意，由许昌人掌控着。在广东，新豫商大多是白手起家，从干杂活、零工开始，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并从市场的夹缝中寻找商机，靠着灵活头脑和拼搏精神打出一片天地，据统计，在广东的河南人有400多万，自主创办的企业有9200多家，其中超亿元的有10多家。在新疆，有人说“新疆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河南人”，360多万河南人创办2万多家企业，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的有7000多家，注册资金300万元以上的有120多家。在山西，经商的河南人有10万之众，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不下50家，河南人在山西从事建筑工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就有1000多家。在湖北，河南人约有200万，其中投资经商办企业的有10万人，资产规模超过100万的有300多家。在重庆，河南人约有2万多，创办的企业有1000多家。在江苏，河南人有10多万，创办的企业也有1000多家，资产上亿的企业有近10家。在天津，河南人一直保持在10万以上。在甘肃，资产亿元以上的豫商企业有数十家。在山东，豫商虽然规模不大，却十分“抱团”。在港、澳、台，也有一些河南人活跃在不同经济领域。除此以外，在国内的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涌现出一个庞大的河南人群体，不仅在著名金融机构担任领导职务，而且还输出大批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有人甚至称之为金融界的“河南现象”。

在国境之外，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新豫商的脚步也越走越远，力量越来越大。有的已经成为所在领域的翘楚，有的通过努力在所在地区的某些行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有的仍在创业，但前景无限。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豫商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涉及的行业十分广泛。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海外的河南人超过45万人，遍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亚等地区；在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罗马尼亚、新西兰等地，新豫商已组建了完善的海外河南同乡联谊会，人数最为庞大的是下设7个分会的美国河南同乡会。在罗马尼亚，70%的华侨都是河南人，而其中又以开封人和郑州人居多。

新豫商群体形成后，乡缘、乡谊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建立并加强了联系，各地的河南商会也应运而生。国内第一家河南商会于2004年7月在上海诞生，此后，山西、新疆、广东等地的河南商会相继成立，目前，除西藏和黑龙江外，各主要省区都有豫商组织在活跃。为满足广大豫商“联桑梓之谊、合群聚而笃、致宗奉之诚”的愿望，2006年成功举办首届豫商大会。以后每年办会一次，已成为新豫商共谋合作繁荣的平台，成为凝聚发展力量的号角，成为助推中原崛起的引擎。从参会人员的数量看，第一届600多人，第二届800多人，第三届突破1000人，此后年年都有新增长。从参会人员的分布看，第一届参会代表大部分是河南本地人，第二届基本上是国内各地豫商，从第三届开始不仅有国内豫商，还有海外豫商、华商，甚至外商；不仅有全国各地的河南商会，还有在河南的外地商会；不仅有企业家，还有科学家。从会议影响看，参加第一届豫商大会的只有14个商会，第二届增加到27个，而第三、第四、第五届则达30多个。从会议成效看，第一届豫商大会签约金额48亿元；第二届335亿元；第三届229.2亿；第四届138亿元，另签融资意向金额312亿元；第五届201.7亿。

新豫商以自己的实力宣告了群体崛起，以自己的组织凝聚了群体力量。然而新豫商之“新”，不仅在于新时代，而且在于新概念，更加在于新特征。“新豫商”是一个超越地域和乡谊等传统观念的广义概念，包括当代所有河南企业家，无论创业于河南本土，还是创业在省外海外，或是在河南经商的非豫籍人